



刘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朱俊岩 魏卓丽译  
三省三校

# 克里姆林宫内幕

——我所经历的斯大林时代

# 克里姆林宫内幕

(美)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张俊岩 魏卓丽 译

许省三 校

中国盲文出版社

1988·北京

责任编辑：郝捷

封面设计：高速

## 克里姆林宫内幕

(美)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

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华勘517队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7.2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5002-0288-1/D·36

印数1—16000

定价：1.90元

## 编者与译者(代序)

**编者：**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此书的？

**译者：**两年前，我们去省图书馆找一位朋友，发现他的案头上放着此书的俄文原版，便随手拿起翻看。不想，这一看竟不愿释手，于是，萌发了将它译出的念头。

**编者：**你们是如何认识此书的？

**译者：**作者从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一直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和苏联高级官员的政府公寓，对苏联上层机构有些了解，且书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谈话和记录，所以，它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人物和事件我们以前就知道一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是皮毛性的或过滤了的，或歪曲了的，这对了解历史原貌不利。现在，正值开放之际，苏联也在搞公开性。无论叫开放还是公开性，这总是历史的进步，如何体现出这个进步呢？那就要比较。因此，恢复历史原样对于比较便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基洛夫神秘地被暗杀，斯大林的妻子令人迷惑不解的自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政权上的较量，以及肃反运动给苏联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历史负担等等，这一切并不象以前所做的结论那样简单。苏联目前大规模地为历史冤案平反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且蒙冤七年，所

以，在叙述中难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强烈，如作者对斯大林就带有极强的个人偏见。因此，我们在读此书时要有一个客观评价历史的态度。

1988年7月

# 目 录

编者与译者（代序）	（1）
一、“老布尔什维克”时期的生活	（1）
革命后的莫斯科	（1）
克里姆林宫和它的新居民	（9）
鱼腐先见头	（21）
斯大林与“老布尔什维克”	（26）
二、新统治者	（43）
“政府公寓”	（43）
饥荒时期	（53）
报复的日子	（60）
斯大林之流	（76）
告密者和特务的王国	（100）
三、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谋杀	（114）
谢尔盖·基洛夫之死	（114）
诊断书夺去了医生的生命	（120）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秘密之死	（122）
对阿利卢耶夫家的迫害	（136）
彼·阿·克拉西科夫之死	（143）
谁加快了列宁的死？	（147）

四、编造的特务中心案 .....	(156)
米霍埃尔斯—阿利卢耶夫案 .....	(156)
苏联反犹太主义的活动 .....	(216)
最后一幕：判决 .....	(219)

## 一 “老布尔什维克”时期的生活

### 革命后的莫斯科

1922年春天，当时我刚18岁，是个满怀激情的姑娘。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被剧院光彩迷人的舞台及革命、社会主义的口号所吸引。在家乡敖德萨市读完中学后，我放弃了祖辈的家产，独身一人、身无分文、无亲无故地奔到了大革命后的莫斯科，来到了那向往已久的新生活和大剧院之中。

我的少年及青年时代是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极其艰苦，几乎是无法忍耐的条件下度过的。在敖德萨市，这些条件尤为艰难。这里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就被乌克兰拉达（译注：1917—1919年乌克兰的白俄反革命中央机关）所扼杀，随后便出现了红军，继之是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干涉者和称号为盖特曼的斯科罗拔德基<sup>①</sup>“独立”政府。这里又有红军，又有白匪，又有侵略者——这次是法国侵略者……又是红军，而后又是白匪……。这些年里，政权在这个城市不止更替了几次或十几次。这里，有些政权尤如昙花一现，可每一新政权的建立都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饥荒、无休止的镇压、迫害、掠夺、枪杀。敖德萨市的居民能够活下来很不容易。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尤其艰难。我的双亲——父亲和母亲是小学教师，毕生都在敖德萨市犹太人的公立学校教书。这



所学校是由犹太人的社会团体的公益资金和一些富裕的企业主、批发商的捐款而建立的，并且依靠他们来维持。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学生都是些穷犹太人的孩子。当时，学校的教育是为培养孩子们到商业、机关去工作。因此，如果除去技校，对贫穷的犹太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唯一的就业途径。高等教育和自由职业的选择只有那些高等或中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享受。

我的父母是思想道德水平较高的人，他们并不简单地把本职工作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当成在完成自己人民所赋予的责任，他们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工作上。我们家住在校内的一座院子里，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这所学校的特殊环境中度过的。从我懂事时起，每天的作息时问都由学校的铃声安排。我的父亲对学校的生活情况很关心，可他对社交活动一点也不感兴趣，对捞钱的本事他更是一窍不通。因此，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家几乎穷困潦倒，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概正是因为在我成长的年月里的贫困和生活条件的低劣，使我过早地萌发了对艺术，特别是对光彩迷人的戏剧世界的爱恋。

然而，对我的生涯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我同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的相识和接触。他们都是来自北方的布尔什维克，并在敖德萨市临时栖身。其中有曾在巴黎工作过几年的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杰出的音乐家采尔涅茨卡娅一格申莉娜。从她们那里我学到了音乐知识。导演格拉戈林和阿达舍夫曾在敖德萨市建立了一所轰动一时的艺校。我们这些少年都被“革命”的新艺术所吸引。当时，我们热爱的诗人是古米廖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sup>②</sup>（当时

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这些人)。剧院里最受崇拜的是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sup>③</sup>，他的革命艺术是为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服务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

刚到莫斯科我就成了革命后建立的国立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同时，我也开始在梅耶霍德剧院所属的实验制片厂工作，我很快就投入了那沸腾的学生生活。在学校和梅耶霍德制片厂时的学习、戏剧表演、演讲、诗歌朗诵、参观综合陈列馆、大教室内的学术讨论，使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社会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都是为革命、为苏维埃政权、为共产党。我们认为革命、政权、党无疑将尽快实现人类平等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人民的幸福。但是，我们认识现实生活的能力还很低，这个政权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引向那里，我们都一无所知。

学习“社会工作”当然是必须的。我在共青团区委做宣传工作，给青年工人们讲解就连我自己在当时也不太理解的党的一系列决定和政治事件。

那些年莫斯科的市容比起革命前来变化不大。一些旧教堂和美丽典雅的旧街道尚未改造。

城市的最中心地带，有莫斯科旅馆、部长会议大厦、两层楼商店和异常丰富的各种猎人粮店，对面，在特维尔斯克大街（现在的高尔基大街）的前面有圣母教堂，同它并排着的是有名的商人饭店。

没被改造过的莫斯科的老街道和胡同——阿尔巴茨基、普列奇斯杰克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等街道还保留着难以形容的魅力。在主要街道上还有很多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起的多层楼房。居民分得的住宅宽敞、舒适，但煤气只有

很少几家有，暖气同样也很少。绝大多数住宅还是靠木柴取暖，至于统一供应热水和垃圾管道这样的方便事，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洗澡有大澡塘，如果自家有洗澡间并且没被改成起居室的话，自己可用木柴烧水洗澡。莫斯科大部分的洗澡间都遭到了这种厄运。当时，有些澡盆被随便扔掉，或者铺上床垫把它当床用。

街道全是鹅卵石铺成。大街上，咣铛咣铛地跑着拉散坐的四轮马车——这是个体运输的唯一形式。当时，小轿车很少，而且只有委员们才能坐上。很长时间以后，大街上才看见了第一批出租汽车。这种小型的、黑色尖鼻子汽车是雷诺牌汽车。我记得，这在当时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人们互相询问：“你坐出租汽车兜过风吗？”但在此之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曾有过一种车箱涂着特别耀眼的黄色，车内挂着黑布帘的租赁汽车。这些车大部分都是被有家不归的居民幽会所用，莫斯科称这是“车轮上的妓馆”。当时，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无轨电车，更没有地铁，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破烂陈旧并时常挤满人的有轨电车。

马路上的雪没人清扫，人行道上的雪只是被扫到边上堆成雪堆。到了初春，雪渐渐发黄，上面形成了无数个车辙。当雪开始融化时，街道泥泞不堪，很难行走。水顺街而流，遍地是深沟，行人稍有不慎，就会走进没膝深的水中。

当年莫斯科的政治气氛很独特。当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把国家引进混乱和饥荒，濒临崩溃的时候，列宁（不包括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左派）预见到了，要想把国家从濒临崩溃的边缘解救出来，只有放弃教条的共产主义定理，恢复，即使部分恢复以个体及市场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

济，实施新经济政策。经济虽处萌芽状态，并且矛盾众多，但放宽还是带来了繁荣。

当然，不用研析新经济政策，也不考虑它会不会马上就给国家带来安宁和幸福，或者会在俄罗斯被果树装点的河流里淌满牛奶。不，新经济政策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水平和战时共产主义相比可以说是安宁、幸福。但是，国家还出现大量失业，还有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失去家庭而无家可归的成群的儿童在大街上流浪。农民刚刚挺起腰枝，但生活还相当困难。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虽然比新经济政策以前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些。同时还有少数人，当时人们称之为“耐普曼”（译注：苏联新经济政策初期新生的资本家、商人和投机者）的一些人，如鱼得水，很快就疯狂般地富了起来，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商店是为他们所开，高级饭店甚至纸牌赌场为他们而设，高级饭店门口及其它花天酒地的地方，套着健壮的大马和铺着熊皮的雪橇等候着他们，马车夫们喊着：“大人！让快马拉您兜兜风吧。”

我们年轻人对这种社会反差，对平民百姓和“耐普曼”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非常敏感。我们还没有能力理解自由经济即使在局部恢复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什么样的良好作用，也没有能力估计到新经济政策的主动性和自由竞争的巨大潜力，只是对“耐普曼”这类很少讲文明、只知一味发横财的人非常讨厌。

随着“新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并形成了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低级的下流文化。书店里摆满了低劣的读物，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作品，也有些是国产的。在高雅传统的剧院和追求新形式新内容的新剧院之

外，并出现了适应市侩暴发户口味的剧院和各种歌唱团及滑稽歌唱家等。我们对这种“耐普曼”式的下流文化深恶痛绝。

当时，我们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我们得到的助学金只够吃些简单的饭菜——刚能吃饱。我们衣衫褴褛，大部分人——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帮助的人——不得不边学习边找些零活做。我记得我还在一个个体商店里干过几个月，每天，穿着瘦小、不合季节的鞋子，沿着莫斯科那阴冷潮湿的街道，步行很多里路给货主送货。

在青年时代，这种困难还算能忍受，况且我们又都充满活力。革命口号的酒香尚未刮走，还在酣醉着我们的大脑。我们真诚地相信着将要给全世界带来平等和幸福的共产主义。我们觉得好像地平线上将要出现新生活的曙光，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暂时艰难和痛苦很快就会过去。

在青年人尚未失去对社会主义思想信任的基础上，此时俄罗斯——首先当然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经历了短暂的但却是闪光的“文艺复兴”时期，旧俄罗斯文化复苏，新俄罗斯文化诞生。

新经济政策随着对经济的放宽，也出现了一些限制放宽的内部规定。可以说，这些放宽在思想意识、政治和苏维埃国家的上层建筑方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存在的，有关思想意识的基本问题及社会世界观，尤其是具体的政治问题，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是不允许的。对党的“总路线”有一点偏离也要被缢死或粗暴地予以根除。即使如此，全国的精神生活也没有被党及某些领导人的“指令”所控制。斯大林及其执政时期的专制制度还没有出笼，高尔

基尚未实现他那文学的统一标准，尚未用迫使他人接受的“唯一正确”的马列思想去统一对待一切科学、文学、艺术。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即唯一的必须遵守的文学艺术描写手法和内容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也未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时人们好歹还能喘息。

鞭子和蜜钱政策——即对异己者极其残酷的迫害与对为了三十块银币即可出卖灵魂的文学家们进行慷慨地施舍和经常地收买——当时还没有使苏维埃知识分子上层变得象后来那样道德败坏、出卖灵魂。这些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地表现。在文学和艺术界还留有一些不顾党的头号人物的指示，说和写都是诚实和天才的人。

国家物质条件的提高和思想专政的弱化决定了文学、艺术、剧院短暂而空前的繁荣。此时，在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各种作家，后来他们得到了一个模糊不清、没什么意义的称呼——“同路人”（巴贝尔、奥廖沙、特尼亚诺夫、布尔加科夫、巴格里茨基、普拉托诺夫、佐先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特纳克<sup>④</sup>，还有很多）。他们都有共同思想，即不能成为苏维埃宣传的无心喇叭，要在自己的创作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以共产主义倡导的思想和目标为目标。确切地说他们没同党走“一条路”，但他们却奔向党倡导的目标。所以，他们暂时被留用并受到了表扬，同时他们每人却尽力思考和理解近年来的一些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苏维埃人民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的波动。当时，在一些剧院，象莫斯科的艺术剧院和小剧院、列宁格勒的亚历山大剧院等，俄罗斯戏剧艺术的旧核心尤如落日余辉，在这里还保留着伟大的演员和导演的艺术传统，这些艺术传统又被传授

给了当时新建的剧院、艺校和制片厂。

由艺术戏剧学校分校为前身的第二所莫斯科艺术剧院比较接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up>①</sup>的传统和遗教，在此，米哈伊尔·契诃夫<sup>②</sup>曾轰动一时，但很快就被驱逐出了俄罗斯，戏剧般地流落在异乡。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sup>③</sup>创作的戏剧正值创作的繁荣时期，虽然这位杰出的大师因肺病死时还很年轻，但他却培养了一大批天才的演员和导演，这些演员和导演都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剧院里继承了他的传统。泰罗夫<sup>④</sup>创建和领导的小剧院也发扬了高调的戏剧艺术传统。最后一位喜剧大师阿莉萨·科宁<sup>⑤</sup>就在这里工作。她扮演的“费德拉”和“安德列连娜·卢库夫列尔”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莫斯科戏剧生活中占有显著位置的还有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up>⑥</sup>创建的犹太人剧院。

与这些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戏剧传统并努力吸收新内容的剧院相并雄，当时又脱颖而出出了很多反抗性质的剧院、艺校、制片厂，探索着戏剧的新形式和新道路，他们享受着完全的自由，甚至他们还被称为戏剧艺术界的革命先驱。

当然，弗谢沃洛德·埃米利叶维奇·梅耶霍德与他创建的剧院在新戏剧的形成中也起了主要作用，他的剧院也成了莫斯科青年戏剧爱好者向往的中心和灵感的源泉。梅耶霍德身怀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精华，特别是戏剧文化。梅耶霍德具有抗争的性格，他竭力摆脱习俗，追求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他的这种个性与革命很相适应。他对革新、对大型剧院的精华及表现主义的渴望，形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他被叛乱、起义、红旗和对一切旧传统的抛弃所陶醉，同时，他和我们大家一样对浪漫主义思想所导致的那可怕的实际生活没有

料到。

梅耶霍德是位非凡的艺术大师。他具有特别的创作才能和独具一格的天才。他所创作的戏剧情节感人、渲染力强，他制作的布景令人惊叹。

当时，梅耶霍德在莫斯科的戏剧界具有特殊的影响，我们大家——戏剧学校的学生，年轻的演员和导演——都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和鼓舞者，我们的生活与梅耶霍德剧院和他的“制片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戏剧如《宽宏大量的戴绿帽子者》、《长满橡树的地方》、《怒吼吧中国》，以及后来的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平均主义及唯我独行的政策和制度当然是不能容忍梅耶霍德这种明了世故、才华出众的人的。没过几年，苏维埃政权就关闭了他的剧院，很快逮捕了他并处以死刑。在那些年里，我们谁也想不到，等待着我们的老师，这位卓越艺术家的竟是这种厄运。

这就是我到莫斯科后尽情地享受的文化生活。雷雨过后的清新，激情振奋，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对在艺术学校及梅耶霍德剧院时期所享受的人类文化财富的爱恋，这一切我感到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 克里姆林宫和它的新居民

二十年代初，我到莫斯科时，住房问题还没象后来那么突出。在革命年代里，首都的居民大大减少了，市里那些逃走或死去了的房主留下的房子相当多。这些房子很快就被新住户占完了。大房间被用胶板墙隔成小房间和贮藏室，形成



了苏维埃公共住宅的特点。住宅里是公用厨房、厕所，吵闹、打斗无休无止，完全没有西方人所说的Privacy（静居）之感。

来到莫斯科后，我很快也在市中心库兹涅茨基桥区的公共住宅中得到了一间小住室。但这间专门分配给我的房子，我却几乎没有使用。在艺术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位纳塔利娅·费多罗夫娜·克拉西科娃，她是老共产党员、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彼德·阿纳尼耶维奇·克拉西科夫的妻子。她自己也是革命前的党员，所以艺术学校的党务工作就由她主持。对我们来说，她既是位老同志、教导者，又是党的领导。在学校里她很受人们的尊敬。

不知为什么，克拉西科娃就象母亲一样爱我。她自己没有孩子，她丈夫的前妻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另一个单独生活。克拉西科夫夫妇俩自己生活。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把全部心血用到了我这个诚实的、充满朝气的年轻姑娘身上。不用说，我不仅也热爱，而且还深深地崇敬他们。克拉西科夫是一位非凡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是列宁的朋友和老战友，他在我眼里成了智慧、英勇、自我牺牲的化身，这使我当时感到满足。

我就象克拉西科夫夫妇的养女一样，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住了很多年，一直到1931年我和丈夫搬入新建的、宏伟的“政府公寓”。但以后，我们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们，起初是去克里姆林宫，1938年斯大林把他们迁到了政府公寓后，我们就到新住房看望他们。

虽然官方的“苏共党史”里没有提起过，但克拉西科夫和其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却给我讲过，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由